



# 晋中的明代长城

(上接第8版)

马岭关口诸关隘位于明顺德府沙河、邢台、内丘三县西界，就是今天的昔阳县、和顺县与河北省邢台县、内丘县相邻地区，建于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(1506年—1566年)。

左权县境内的长城，为明代河南省所建。黄泽关北门门拱上方嵌一方石匾，正中阴刻楷书横排“飞磴盘云”四字，上款阴刻楷书竖排“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季春吉旦”，下款阴刻楷书竖排“巡抚河南都御史秦中李宗枢建”。可见，黄泽关的修建年代为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。

明代“九镇长城”是抵御蒙古族南下、东进的庞大防御体系。终明一代，长城的修建、修复与蒙古族的南下、东进一样是非常频繁的。晋中昔阳、和顺、左权段的长城多建于明嘉靖二十年(1541年)至二十二年(1543年)期间。在此期间，据《明史》载：嘉靖二十年(1541年)秋，“俺答下石岭关，取太原。吉囊由平虏卫入掠平定、寿阳诸处”。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夏，“敌怒，入寇，掠朔州，抵广武，由太原南下，沁、汾、襄垣、长子皆被残；复从忻、崞、代而北……敌遂从雁门故道去。秋，复入朔州……”在如此频繁的蒙古族南下、东进的情况下，为保障京师、北直隶安全，真定府、顺德府等地纷纷修筑长城。现存于马岭关的《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》石碑，记载

明嘉靖二十年(1541年)，“狄人入寇，陵辄山右，至围太原，逼并陘，恒襄震动，谓其与接壤也。无何，虏还……”于是顺德府“每隘筑城，每城建楼，中设重门，以严启闭。傍列营房，以便直宿。树墩堡以备瞭望。缭垣墉以防越度。为关通行者六，为垣塞隘者二十有二”，即修筑了6座关城、22座隘口。《西关志》所录的《鹤度岭边城记》碑和《大岭口设险记》碑，记载了由于明嘉靖二十年(1541年)蒙古族南下，顺德

府于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筑成鹤度岭关和大岭口关。

据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九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郑芸所上呈《乞恩议定地方载入敕諭以便行事以防虏患疏》，称：“近年来自后沟口(时为平定州乐平县与真定府交界处，今在昔阳县境内)而南，顺德等府及大名兵备道所辖地方，该巡抚衙门修设隘口数多。”又据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九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秀春所上呈《乞恩议定地方载入敕諭以便行事以防虏患疏》，称顺德府“所属内丘、邢台、沙河三县边山一带地方隘口，北自锦绣堂口起，迤南至数道岭有名大口共十处，近来因达贼声息，蒙抚按衙门修筑，并真定府隘口并入并陘兵备道……”可见，从明嘉靖二十年(1541年)蒙古俺答汗大举南下后，真定府、顺德府等至少用了三年时间大规模地修筑了许多关隘。而且蒙古族的南下，已经试图突破传统的“九边”范围，甚至准备从黎城、涉县一路入犯北直隶、河南。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正月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郑芸呈《广集议以御虏患疏》，称：“查得丑虏东犯之路，紫荆关、故关等处亦既有备矣。止有河南彰德府涉县地方，逼近山西黎城等处，山坡平漫，虏可上下。近日山西拿获奸细声言，今岁东侵，多由黎城，盖即涉县一路也。释此不守，纵之过山，欲以决战于平原旷野之地，岂计之得耶？说者以为，河南地方不必过为干预。然丑虏逾山而东，直冲广

(平府)、大(名府)、真(定府)、顺(德府)等府，其祸不在河南而在畿辅，虽山东临清诸处，亦有所不免，此殆三省门户，不可不慎。合无题请或先会同河南、山东并三省之力，共守此险。”这份奏疏指出在河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加强防备的重要性。郑芸的奏疏是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正月上呈的，左权黄泽关“飞磴盘云”石匾的款识是“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季春吉旦”，从时间上可以看出，是年正月郑芸上疏后，河南巡抚李宗枢为加强防备，于季春时修筑或加固了重要隘口附近的关堡或长城墙体。

晋中昔阳县、和顺县、左权县明长城的战争防御功能非常明显，但是其作用不止于此。据左权黄泽关内现存的明万历三十四年(1606年)所立《辽州黄泽关重修义勇武安王庙工峻记碑》石碑，记载巡检霍儒“立墩设堡，关南浚井，岭北摩天，羊纒保障，百草藩篱，奸寇缉捕，商途宁谧”。又据明天顺八年(1464年)所立《重修义勇武安王庙记》碑，有“以验往来诚伪之人”的记载。看来，检查过往行人、防止匪盗也是长城关隘的重要作用。

长城是一段历史，长城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座丰碑。长城的修筑，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，上下两千年，纵横十万里。两千多年来，在长城脚下不断上演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，这其中既有生死搏杀的战斗，也有和睦相处的安宁，长城始终是一条纽带，把生活在两边的民众联系在了一起。

